

文史集萃

第五輯

文史資料出版社

文史集萃

第五辑

《文史集萃》编辑部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文 史 集 萃

第 五 辑

《文史集萃》编辑部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5/8 字数：166,000字

印数：1—14,000册 定价：1.30元

统一书号：11224·167

出 版 说 明

- 一、集萃的资料，选自各地方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各级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的文史资料。
- 二、集萃所选资料，内容包括清末戊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教、科技、华侨、民族、宗教、社会等方面。
- 三、刊行集萃的目的，在于荟萃上述各种文史资料的精华，方便读者购买，扩大这些资料的阅读和使用范围。选入时首重史料价值，兼顾地方特点。所选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但由于作者经历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有不尽翔实之处，仅供历史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参考，欢迎提出补充和订正。

文史集萃 目 录

一九八四年
第三辑
(总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一些历史情况

.....张致祥 (1)

战动总会工作回顾段 云 (7)

军事调处执行部德州执行小组纪实符 浩 (13)

一九四七年上海学生的“五月运动”吴学谦 (36)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前后土丹旦达 (41)

驱逐溥仪出宫始末鹿钟麟 (57)

吴玉章在日本.....〔日本〕宫崎寅藏夫人 (93)

海东同志在病中黄 岩 (95)

杜重远先生事略高崇民 (99)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目击记温守善 (107)

张学良将军一夕话卢广绩 (112)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 (120)

《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 商鸿逵 (149)

附：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 尹润生 (156)

段祺瑞家世琐记 段宏纲 (158)

我所知道的川岛芳子 王文涛 (167)

九十自述——早期经验与影响

..... 晏阳初口述 李又宁撰写 (176)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生活回忆 刘莘园 (195)

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 郭 旭 (211)

国宝归国 刘緝之 (216)

旧社会汕头客栈的一些黑店内幕 邹啸天 (221)

补白：

天津的外汇经纪人洋行 林凤钧 (12)

冯玉祥的读书精神 阮玄武 (40)

吉鸿昌挥毫写“天堑飞渡” 傅二虞 (56)

清末的金融业 应永玉 (92)

记于右任的一首诗 邓长虹 (98)

贺耀组为何辞重庆市长职 周千贞 张生力 (11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关于战区的划分简介 史 说 (166)

潘汉年支持东北抗联工作 董麟阁 (175)

翁同和开复原官稿 陆孟芙 (236)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 的一些历史情况

张 致 祥

七七事变前我在北平工作，那时，我叫管彤。吴承仕、齐燕铭和我在北平编为一个党的特别小组，我是组长，归陈伯达领导。同时，我们也都参加了北平各界救国会和华北各界救国会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芦沟桥事变，平、津两市很快沦陷，平津铁路一度中断。在恢复通车的第二天，我和陈伯达、吴承仕（即吴检斋，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相约同车到了天津。陈伯达安排我和吴承仕住在小白楼一家白俄公寓里，并让我留在天津编油印小报，传播抗日的消息。同时，他通知我，今后与我联系的人是胡锡奎。过了一、两天，陈伯达领着胡锡奎和我接上了关系。不久，我又搬到小白楼一家临街的裁缝店楼上，与王文华同志一家住在一起。

我编油印小报时，先由刘清扬的孩子收听和记录中央社广播，然后把记录下的新闻稿在维多利亚花园（现解放北路花园）的接头地点交给我，由我负责编辑、刻写，最后把刻好的蜡纸交给别人去印刷、发行。这个小报的名字记得是《新闻报》。编印

几期以后，我觉得小报的内容只有消息，没有分析和评论，便向组织建议，将小报改成刊物。经组织同意，改为《时代周刊》（一周一次，十六开本），仍由我负责编辑。刊物除继续刊登中央社及路透社等外电消息外，还刊登一些文章。稿件的来源，一是我自己写些文章或由我翻译外国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和评论（我的笔名是奋若）；二是姚依林同志送来的稿件。另外，吴承仕也写过少量的文章。我编好后交王文华同志去刻写、印刷和装订。刊物的一部分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交给其他同志，通过他们和“民先”组织发行；另一部分由我通过我伯父管洛声推荐给一些上层人士（如王若僖在未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以前一直是个订户）。这个刊物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八年九月。

我在天津的另一个活动，是参与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工作。

据说对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称，目前存有多种说法，就我个人记忆，它当时的名字是“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因为，现存的那时给刘建章的委任状的关防上刻有“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字样，应当说是最准确的根据。委任状当时用白綾子制成，以便携带。上有红色边框，里面印着黑色长宋体的字，全文是：“兹委任×××为××××。主任委员王若僖”。下款是“中华民国××年×月”，还加盖着“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关防（印章）。

记得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华北各界救国会。一天，我们在刘清扬家里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有杨秀峰、刘清扬、王仲华、李楚离、张友渔、吴承仕等。会议上分析了形势，认为华北各界救国会已不适应形势

要求，因此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后来，刘清扬离津去武汉，她在那里曾汇集了一册《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不知道出处在哪里。在我的记忆里，当时在天津并没有这一组织。只记得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曾建立了“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设在天津英租界里，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有王若僊、赵伯弢等。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厅备了案，实际上是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自卫委员会刚成立时，成员大都是北平搞救亡运动的那些文化界、教育界诸人士。代表党负责自卫委员会工作的是李楚离和王仲华，后来是姚依林和朱其文。

自卫委员会下面没有设其他直属组织（最近看到个材料，说冀东当时有自卫委员会的分会）。但那时天津的一些大旅馆都曾做过我们的联络点。李钟奇同志负伤后到天津治疗时就住过交通旅馆；冀东暴动时，冀东来的人就住国民饭店；党内联系一般都在佛照楼，渤海大楼、基泰大楼也都是我们的联络点。

杨秀峰、刘清扬等人离津后，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经上级党决定，自卫委员会吸收了天津的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担任委员会的成员。这样，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变化，由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僊担任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的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北洋工学院教授路秀三、原西北军的张述孔等人也都进入了自卫委员会。

当时自卫委员会的工作，除出版刊物传播抗日消息外，主要是进行统战工作，和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组织华北抗日武装。

在统战工作上，我党一方面动员当时在津国民党上层人士参

加自卫委员会；另方面也争取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去。如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李宗仁、白崇禧派的刘绍襄来天津，党就决定谢甫生和我去找他，动员他去冀东，并准备让他担任冀东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后来，他去了冀东和平西，但此人受不了苦，最后又回来了。

在组织华北抗日武装力量方面，最突出的是参与组织冀东暴动。冀东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早就进行了，原准备在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发动。冀东暴动的主要力量有：李运昌组织的农民群众，高志远的民团以及原西北军系统的洪麟阁旧部。当时确定建立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任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

为了有力地支持组织冀东暴动，我们还想尽办法筹备物资。记得当时通过关系弄到一些通讯器材；又以募捐的形式搞到了一些医疗器材和药品。这些物资都送到了冀东。

党组织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还争取过冀中魏大光的部队。魏大光原是一个土匪，曾被捕过，为当地公安局长李公侠（我党党员）释放。抗战爆发后，党派李公侠去争取魏大光，还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委任魏大光为一个支队的司令。

刘建章等其他一些同志组织抗日武装时，也是由自卫委员会委任的。

当时党组织武装力量之所以要由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加委，主要是为了使这些抗日武装能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取得军饷。为此，党曾派我先后到武汉、冀中去活动。去武汉大约是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此行与冀东暴动有关系。我去武汉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刘清扬的关系，找国民党当局要军饷，同时，找八路军驻武汉

办事处叶剑英同志汇报。我到武汉的路线是从天津坐船到香港，然后从香港经广州到武汉。到武汉后，由在武汉任国民党参政员的刘清扬陪着我先到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二厅。我提出要求后，他们推说国民党政府已派了鹿钟麟负责华北事务，要我去找他，想推出了事。

我也到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那里的同志领我去叶剑英的住所，我向叶剑英汇报了党在华北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在武汉大约住了一个星期。我还见了当时著名的“七君子”中的几个人，向他们作了宣传华北抗日情况的报告。此外，还找了郭沫若、张申府等人。

从武汉回津后，由朱其文同志和我联系。不久，组织上又决定我去冀中，给我两个任务：（一）视察魏大光的部队；（二）到南宫找鹿钟麟，要求其给予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军饷。另外，由我单独找冀中黄敬同志，转达党组织一些意见。这次去冀中，除我以外，还有路秀三、赵伯弢、张述孔。走前，我利用了天津红帮龙头老大哥姜般若认识伪军警督察长的关系（在此之前，我和李楚离、王仲华按组织决定加入了红帮），他给了我一个伪军警督察署督察员的职称，利用这个身份，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哨卡。

去冀中，我们先到胜芳，被当地驻军软禁，经与魏大光、李公侠联系才到了堂二里。在堂二里，我们视察了魏大光的部队，和李公侠（当时任魏支队政治部主任）谈了工作。然后，我们才到了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青塔。到那里后，我要求见黄敬。当时冀中环境复杂，由于我没带证明信件，不仅不让我去见，并且要我们按原路返回天津。我在半途中，在苏桥找到供给

部长熊大缜（系清华的同学），由他介绍，我们又回到青塔，才见到了黄敬，我向他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随后，吕正操同志会见了我们，说到敌人正准备“扫荡”冀南。后来，他派了半个骑兵班把我们护送到冀南。我们到达冀南的当夜，鹿钟麟见了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推了事，强调日军就要“扫荡”，他也要转移，要我们立刻离开。这样，我们只得转去献县。到献县后，赵伯弢利用当地天主教堂的关系，独自坐送经书的车去了泊镇。我们也经泊镇坐火车回到了天津。

大约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逐渐停止了。这时，河北省委撤离了天津，党又成立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我的党的关系又转到了点线工作委员会葛琛那里。后来，葛琛同志通知我去平西抗日根据地，那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事了。

我在天津时，曾利用我伯父管洛声的利亚书局（今中原文具店），帮助一批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也曾利用这个书局作为接头的地点。

我认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这个组织及其活动在历史上是应当肯定的。抗战爆发后，党把华北各界救国会转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是适应了当时形势需要的。党通过它进行的工作及其所作的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对当时开展华北地区人民武装抗日活动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战动总会工作回顾

段 云

一八三七年九月，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成于太原失陷之前。当时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到太原，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共同组成战动总会，从事战地动员，以支持晋察绥地区敌后抗战。经过商谈，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除奸部长由国民党改组派郭任之担任（郭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方面派南汉宸任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阎锡山方面派梁化之任组织部副部长，薄右丞任宣传部副部长，王尊光任动员分配部长。宣传部长由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担任（李未到职，后来确定由隐蔽的共产党员赵宗复作为阎方的人代理此职，不久亦离开）。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对抗战失去信心，对国共合作开始动摇，他看到不能控制战动总会，便对战动总会存在戒心，撤走他派到战动总会的人员，阴谋拆战动总会的台，使战动总会孤立起来，失掉统一战线的合法名义。这时，周副主席在汾阳对程子华同志做了指示，周副主席说：阎锡山撤走他的干部，要拆台，我们不要上当。战地动委会的组织形式还需要，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战地动委会顾名思义，就要活动在敌人占领

的‘战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撤走干部也好，便于我们更好地发展。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时，续范亭同志，经过周恩来同志和战动总会内程子华等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工作，他态度坚决，坚持打游击战，坚持把战动总会的工作搞下去。续范亭同志的旧友杨集贤（战动总会副主任）、郝梦九（战动总会动员分配部长）都愿跟他搞下去，郭任之部长也主张战动总会在战地打游击。这样，在战动总会里，不仅有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和阎锡山的人，因而才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得以保留下来。续范亭同志坚持把战动总会搞下来，坚持与党合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到战动总会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抗日积极性很高，各方面表现也都好，感到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精神很愉快，决心同大家一起战斗下去。这样，战动总会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得以保持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发挥它的重大历史作用。战动总会开始撤到汾阳、离石，根据党中央的意图，转而北上，深入晋西北敌后，与八路军一二〇师靠拢，以便协同动作，开展工作。

战动总会的活动地区，包括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西省。不久，晋东北地区属于晋察冀边区，所以战动总会活动地区主要是晋西北、雁北及绥远、察南。在这些地区，战动总会配合八路军及牺盟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团体，组织自卫队、游击队等抗日武装，积极摧毁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并同阎锡山旧地方政府、旧军队的阻挠破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在这些地区，战动总会的工作，实际上同党的工作是密切不可分的。党通过战动

总会进行活动，党的机关隐蔽在战动总会之内，许多县、区党的书记就是县、区动委会主任或组织部长。战动总会作为半政权性质的机构，有威望，群众拥护，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作。战动总会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组织抗日自卫队、游击队，然后升级为正规军，扩大党所领导的武装。党通过战动总会进行建党、建政、建军而外，还通过战动总会进行对阎锡山、傅作义、邓宝珊等人的统战工作。

战动总会这个新的革命组织，一经成立，工作即迅猛开展，声势远扬全国以至国外。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吸收了成千的城市学生和当地的青年，迅速建立起各级机构，培养和训练了庞大的干部队伍。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战动总会发动和组织了八个游击支队和察绥游击军，发展了由我党领导的万人左右的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在晋中平川、在晋西北地区 and 长城内外，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停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总会领导下，各县、区动委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晋西北城乡动员了两万多名新战士，补充八路军、决死队、各抗日游击队和其他友军。这次新战士的动员和分配，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贺龙、关向应同志亲自领导的。当时动员的新兵，给旧军队补充了一部分，但主要还是补充八路军、决死队和各抗日支队。由于照顾统一战线关系，补充的真实情况，当时不能公开宣扬。战动总会转入晋西北后，先后派出以武新宇为首的晋察绥工作团，率领第四游击支队，深入绥蒙大青山地区，配合八路军李井泉支队，开辟敌后根据地。派出以郑季翘为首的工作团，到雁北西部和绥南敌占区。派出以焦国鼎、王屏为首的工作团到雁北东部和察南五县开展工作。还派出以陈凤桐、阮慕韩、刘苏为首的察绥游击军，开赴绥东察南，挺

进敌后。战动总会各级机构，在我党的领导下，密切配合八路军各部队，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我游击支队袭扰、伏击、进攻敌人，摧毁敌伪组织，铲除汉奸，神出鬼没，困敌伪军于点线之内。我游击支队广泛开展游击战，有时突然出现在敌人身边，狠狠打击敌人；有时隐蔽活动，待机出击。由于我抗日游击队经常在敌占区活动，群众看到中国军队并未完全跑掉而感到有依靠。他们热爱这些英雄子弟，千方百计给予支援和掩护。战动总会在敌后地区点燃起的光芒熠熠的抗日烽火，有力地激发了敌占区广大群众的民族觉醒，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军、汉奸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同时也引起反动顽固派的忌恨和恐惧。

晋察绥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阵地，战地动员工作是有效地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途径。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战动总会各级组织和所属各游击支队的同志们，个个满腔热血，勇往直前，不避艰险，不怕牺牲。许多同志倒下了，更多的同志又扑上去。这些同志在敌后，面对日军和德王、李守信等汉奸匪伙，后面还有白志沂、乔日成等顽固军，几面受敌。战动总会所属的各游击支队，完全白手起家，没有领过阎锡山政府一文钱，没有得到官方发给一枪一弹。他们在贫瘠山区、补给困难、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他们的枪支弹药，主要从敌人手中缴获而来，也收集了一部分溃兵游勇的武器。战动总会和所属各个支队在抗战中牺牲是很大的。战动总会和四支队到大青山的同志，走时数百人，在抗战期间，多数同志在那里英勇献身。派到雁北东部和察南的同志，走时八十余人，牺牲了

一半以上，剩下只有三、四十人；战动总会所属第一支队在晋中平川活动，仅仅十一个月时间内，先后牺牲了刘森堂、谭公强、周平三个支队长，他们都是从八路军调来的老红军指挥员。可以看出，在民族濒于危亡的时刻，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确实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修筑新的长城。可以看出，有民族自觉和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是无往而不胜的，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战动总会在晋察绥地区所建立的惊天动地的抗战业绩，深入晋察绥地区千百万人们的心中。战动总会的巨大抗战业绩，是我党进入抗日战争这一历史阶段，改变斗争策略，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硕果。它在各方面奠定的工作基础，对我党在晋西事变中取得胜利，对尔后建立晋绥抗日根据地，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革命力量的发展，对于顽固势力来说，是最头疼不过的。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早就表白过他内心的恐惧和矛盾。他曾说过，日本人来了，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群众发动起来了，控制不住是个“乱子”他原想让共产党人到敌占区去，同日本人斗，等到两败俱伤，然后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勉强答应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战地。所谓战地，实际上是指敌人已经占领的区域。即使在这些地区活动，仍多方给以限制。但事实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原来的盘算。日本人当然是受到我们狠狠的打击，而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的力量，却一日一日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切违背阎锡山所谓“存在就是真理”的原则。一九三九年春天，阎锡山急不可待，召开秋林会议，在会上有计划地进行反共、反进步，进行反动部署。会议一结束就传出取消战动总会的